

# 以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 进行当代文学创作

——马瑞芳教授访谈

□张丽军



张丽军:马老师您好!您是山东大学古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同时在当代文学领域有着出色的成绩。请问您是如何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得益彰的?

马瑞芳:我在1978年调回山东大学的时候,先搞写作。1978年我在《山东文学》发的短篇小说叫《儿科专家》。1979年在《山东文学》发的散文《女学究轶闻》,马上就被当时的《新华月报》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又写出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在80年代初,我被人当成一个散文家。当时我的写作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所谓家事。第一篇关于家事的散文叫《煎饼花》,沙叶新和张承志给我起个外号,说我是“煎饼专业户”。第二篇关于家事的散文是1981年在《山东文学》发表的《祖父》,《祖父》这一篇实际上应该比《煎饼花》还要深刻一点。针对这篇文章,有两个人写了评论,一个是回族评论家白崇仁,他在评论中提出:《祖父》体现了一个民族;另一个评论是我的老师孙昌熙先生写的。家事方面,后来又写了像《遗产》《母亲》《马老太语录》等。《马老太语录》中讲到,从小我母亲就用“红楼”“聊斋”来教育我。李心田老师就说我发在《人民文学》的这篇文章,给了他很大启发。我的这些散文,不管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还是山东文学史当中,都占到两章,其中有一章就是关于写“家事”的。

第二个主题,李希凡把它命名为教授文学。从1979年开始,在《女学究轶闻》中写冯沅君,后来写高兰、陆侃如、萧涤非、吴组缃、田仲济等,都成册了。而且这里面还出了一些花絮:当时我父亲和田仲济先生都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那个时候家庭都没有洗澡的条件,他们两位去开常委会的时候就顺便洗澡。他们洗澡出来以后,田先生把我父亲的裤子拿去穿了,我就把这件事写到了文章里。田老很恼火,开会遇到我,他说你说我穿了你爹的裤子,如果你爹也这么坚持,我就要向他请教。我回去就问我老父亲,我说他到底弄错了吗,父亲说是田先生弄错了,但是你不要这么写,让我赶快去道歉。我道歉之后,写了一个散文集叫《学海见闻录》,是田老给写的序,田老这个人很好。当时我写的教授散文,几乎每一篇,不管是《女学究轶闻》,还是写黄家驷的名士风格,《新华月报》《新华文摘》都转载了。

第三个主题是留学生文学。1980年开始,我带六个国家的留学生,那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遇。我从1983年开始在《散文月刊》等写了一组留学生教学札记,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篇叫《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其中有一个情节是写和留学生谈《西游记》的,我分析《西游记》时,有一个留学生挑衅,他说我认为《西游记》中猪八戒这个形象写的是中国高级干部的形象。我不假思索地就说他说的不对,因为中国高级干部的代表是周恩来总理。留学生没有吭气,课间休息时,留学生跟我说:我不忍心反驳你,因为周恩来属于全世界。这个文章于周总理逝世的1月8日在香港报纸发表的时候,配上了周总理很大的画像,改名叫《周恩来属于全世界》。香港的报纸谈到:马瑞芳是中国第一个写改革开放文学的,就是留学生文学。

到了90年代,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不是散文能够概括的,特别是我认为改革开放中人的变化需要长篇小说。这样我就从1985年开始到1992年,写完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当时给它起名叫《新儒林》,牛运清老师给我改个名字叫《蓝眼睛和黑眼睛》,成为当时的街头流行书。1993年该书是很轰动的,因为当时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写大学生活的并不算多。特别感动我的就是陈荒煤先生,他做过文化部副部长,我把小说寄给他,他拿到之后连着看了好几天。他说这才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而且这个小说是真正继承《红楼梦》的优秀传统。陈荒煤先生写了4000

字的亲笔信,文学所的教授在会上宣读。他从各个方面给了很高的评价,雷达等评论家都去发言。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几个80岁以上的老作家、老专家发表意见,一个是陈荒煤,另一个是山东大学原校长吴富恒,再一位就是田仲济。

第一部小说就引起这么大的动作,接着我就写第二部。因为我经常参加红学会,红学界的一些朋友对《蓝眼睛和黑眼睛》非常感兴趣,都很喜欢。冯其庸、李希凡等红学家都看了这个小说。小说当时引起的反应就是很有普遍性,社科院的老师参加讨论说这个小说写的是社科院的事,北师大的老师参加说是写的北师大的事。他们就说马瑞芳你不要再研究《红楼梦》了,你再写长篇小说,我们都给你提供素材。他们不光提供素材,他们还给起名。有个女红学家说现在学术界最大的特点就是红眼病,你第一部长篇叫《蓝眼睛和黑眼睛》,我给你第二部小说起个名字叫《红眼睛和绿眼睛》。我真采用了这个题目,已经都发给出版社了,牛运清老师说这个题目得改,出版社也认为这个小说虽然叫《红眼睛和绿眼睛》,但是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奉献和他们的那种正气,并不是负面的东西。牛老师就说这个小说里面写到一只猫,也采用一些魔幻的手法,这个猫是一只红眼睛、一只绿眼睛,它脑门儿当中还有一只天眼,是气功师给它开的天眼,它能听懂人话,它能像人一样思考,最后还说人话。牛老师说那就叫《天眼》吧。《天眼》应该是比《蓝眼睛和黑眼睛》写得更像长篇小说,因为在《蓝眼睛和黑眼睛》中,我是特别想像巴尔扎克那样,做时代的秘书,记的很全面,而《天眼》比较侧重于人的内心。而且我在写《蓝眼睛和黑眼睛》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因为我一辈子受《红楼梦》影响太深了,到了写《天眼》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借鉴西方小说。因为我虽然是教明清文学的,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西欧小说和俄罗斯小说,像西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特别是俄罗斯的小说我都非常熟,就有意识地借鉴。

第三部我想系统地写改革开放一直到1997年整个大学发生的事,写大学里面这些人,从校长书记到系主任,一直到老师怎样拼搏,这里面林林总总的,有很著名的教授,也有很邪门的教授,各种各样的众生生态都有。我给它起的名字叫《感受四季》。《感受四季》是在山东省政协开的研讨会。专家对《感受四季》总的意见就是在我的这三部长篇中,一部比一部写的好。他们都说这是很少有的现象,说一般都是第一部写得好,后边就不行了。他们的结论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传统文化,一直有底气,视野和眼界高。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在当代卷专门研究了马瑞芳小说。孙犁先生说过一句话:文学史上的一句两句截都不容易,而我居然被他们写进了《中华文学通史》。这说明我的力气没有白花,也说明我所接触的这个题材是有价值的。就是因为我在研究小说史的时候,一向认为长篇小说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我这个长篇小说也是写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中国社科院就把这个以小说史的形式,以文学史的形式给固定下来。新世纪,欧洲举行了一次亚洲文学研讨,也研讨了我的作品,此外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涉及了我的散文作品。

不管是从1978年开始发表散文,还是到1993年开始发表长篇小说,我在学校里面都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山东大学不主张老师当作家。山东大学有一种很传统的观念,就是如果你是搞创作的,要想在职称方面前进一步,你得比别人付出双倍努力。所以我是活得比较累的,不管是副教授、教授、博导,我的成果都比要求的高出一倍。这要求我得非常努力,所以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为什么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就是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人物总在你脑子里面转,你不可能去睡午觉。

研究和创作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我现在琢磨出了经验,称这是两只兔子,我把这两只兔子赶到一条路上,创作的兔子和研究的兔子都在一条路上。我是以一个当代作家的心态去搞研究,就研究出来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的《金瓶梅风情谭》有很多新观点,因为我是女的,我是作家,我看到的就是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创作和研究放到一条道上来。

1980年,第一届《聊斋志异》讨论会在淄博举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来了,他到会上就约我写《蒲松龄传》,所以我写的第一本专著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书是研究《聊斋志异》,是1990年在山东大学出

版的。关于《聊斋志异》的研究,当时得到了两位高手的指点,一个是吴组缃先生,一个是程千帆先生,这些老先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我的《蒲松龄评传》出版后送给萧涤非先生,他马上就发表评论,说马瑞芳写的《蒲松龄评传》三端具备,那就是:辨士的舌端,侠客的箭端,文士的笔端。程千帆写了封信来说,这本书写的评论详实而有文采,他鼓励我说可以进一步搞研究,说我的研究角度和别人不一样,可以写出一些别人写不出来的东西,这两位老先生指导我的《聊斋志异》研究再深入下去。

吴组缃先生曾跟我说:马瑞芳你要记住,文学研究一定不要大而空,不要听他们说高屋建瓴、宏观研究,没有微观哪来的宏观。这个观点和田仲济先生完全一致,田先生说过同样的话:没有微观哪来宏观,一定要一篇一篇的研究。吴组缃跟我说的第二句话就是:还要注意经济,要知道《聊斋志异》是在清初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聊斋志异》体现了很多思想和这有关。他这个提示就使得我在书中加了一部分叫“神思篇”。而程千帆先生更有意思了,他来主持萧涤非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的答辩。我就去见他,我说程先生我很苦恼,《聊斋志异》创造论写了两遍了,还觉得没抓住要点。他说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现在不是分析他的一些创作成果吗,如果现在你把《聊斋志异》的例子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成立吗?我想想说成立,他说那你就没抓住特点,因为聊斋和他们是完全不同不一样的。除了《西游记》有点类似之外,那几个和《聊斋志异》是全然不同的,所以我才知道《聊斋志异》中神鬼狐妖是最重要的。

《聊斋志异》研究写完了,《蒲松龄传》也写完了。三联书店来说要组织一些知名专家,探讨中国传统文化面向大众这一议题,想请我写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他说要写得特别有文采、精练、优美,要雅俗共赏还要有理论。后来就写出了《幽冥人生》。我那个时候就想,《聊斋志异》研究的都差不多了,我最爱的还是《红楼梦》,我要转型去研究《红楼梦》。我就写了一本书叫《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三篇非常重的学术论文,是关于《红楼梦》的成书研究,在《红楼梦学刊》一年发了三篇,共7万字,而且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复印。

2004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请我来讲聊斋。我在百家讲坛讲《聊斋志异》,一共讲了24讲,创了非常高的收视率。在全国掀起了聊斋热,我更想讲的是《红楼梦》。后来先是到了江苏电视台讲了40集《红楼梦》,又到了山东电视台讲了70集。后来又在北京卫视、深圳卫视、厦门卫视、台北卫视等很多卫视都讲过《红楼梦》。在讲课的过程中就出了好多书。最早的一本是《马瑞芳讲聊斋》。《马瑞芳讲聊斋》出了好几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东方出版中心的,一个版本是中华书局的,还有作家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的,都是畅销书。

从2005年开始上百家讲坛,我最后总结了16个字:传统文化走向大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2013年,商务印书馆一次推出我的两本“风情谭”,并组织了一个大型的研讨会,会上翟泰丰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红楼梦研究经过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大的变化是1954年李希凡向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第二个贡献就是马瑞芳做的,她把这本象牙塔里的书推向大众。关于《聊斋志异》,我现在已经承担了两个国家重大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在2011年,当时中宣部抓的叫做“组织当代一百个作家给古代一百个作家写传”的项目,中国作家协会主管,我写蒲松龄。第二个重点项目是中宣部委托文化部、国家图书馆从历史、文学、哲学、科技等五个方面,选专家解读100部经典作品,叫《百部经典》,我承担《聊斋志异》。

张丽军:现在国家是很重视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您做的这些贡献本身就是用自己的创作把传统文化呈现出来。把创作和评论两个方面最大限度地融合在一起,恰恰成就了您的独特性。

马瑞芳:我早些年刚刚写了几篇散文的时候,曾经很困惑。我想我到底是去专门搞创作呢还是搞研究,也没有人能给我指出路来。我只好继续一边搞研究,一边搞写作,所以就使得自己很累,很紧张,因为每个人时间总是有限的,而且我还得上课,我大概是教了8年的基础课,所以教课任务一直也是很重的。要不断地把新的学术发展补充进去,不断地把新的学术发展交给学生,也得不断地做新的研究,有人说有成就的人是把自己的东西讲给别人听,没成就的是把别人的东西讲给学生听,所以后来我不管在哪儿讲课,都是把我研究的讲给学生们听。

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一诗里说,要追随着大师们学习“歌唱”。写诗的人都有自己私心里拜过的老师。如果在今天的中国询问写新诗的人,你最爱的诗人是谁,你最服膺谁,你的案头上放着谁的诗,我冒昧地猜测,我们给出的答案会以西方20世纪的诗人居多。我们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和火炬传递者。庞德在年轻的时候曾立下壮志,关于诗歌他知道得比所有人都多。我们亦当如此,西方诗歌可以被我们“拿来”,而且已经被我们“拿来”,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许我们反而相对忽略了中国自己悠久的诗歌传统。

我常常想知道现代派诗人和理论家庞德在遇见中国古诗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也许我们应该像庞德那样,以初次相遇的惊奇去看中国古诗。我们都熟悉《长干行》,但也许正因为太熟悉,使我们体会不到惊喜。庞德吃力地透过好几层障碍去读中国古诗,但中国古诗的光辉透过这几层障碍,仍使他迷醉,而那些古诗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对我们而言是“不隔”的。这样看来,中国自己的传统是我们最容易继承的。这时我深深感到对这一传统我们若不去“拿来”,是对自己也是对这一传统的不公正。我们在远望的同时,也需要深知自己脚下的土地。

当代生活与唐宋时代简直是两个世界,但人们依然热爱那些诗词,它们依然说出了人们的心声。这就是诗的魔法。并不是当代的普通读者不怎么读诗了,他们一直在大量阅读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古代诗人得到的最大赞美,就是被他们无法想象的后世的人们所珍重和喜爱。

我们需要以另一种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传统并不是天然地流淌在血脉中,它属于任何努力学习它的人。我们虽然是中国人,但不一定就承载着那些文化基因,它们是需要后天习得的。在五四之后和“文革”之后,中国的古诗传统于写新诗的人而言其实是有些外在的,我们对艾略特的熟悉或许超过了对杜甫的熟悉。而庞德告诉我们,在新的情境、新的眼光下,旧的可以变成新的,古物可以焕发青春,成为写作者们活的源泉。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们有无尽的新题材,许多现代生活的经验尚未表达为诗。在形式上我们应该有新的自由,此外再加上西方诗歌对我们的影响与熏陶。那么我们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继承什么呢?古诗不是抽象文学,承担着重要的人际功能,是人与人联系的手段,发挥着“兴观群怨”中“群”的作用。我们现在未必唱和、联句,也不一定要在宴会上各自赋诗,但中国古诗提供了诗的另一种可能性:诗是自我的,同时也是公共的,是服务于人的。诗中所描述的经验未必是完全私密的,诗的效果来自于言人所未言,此言未曾被他人道出。而说出众人的情感,说出众人都想说而未说出的公共经验,追求共鸣,抵达尚未有语言抵达之处,这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想象诗的功能的路径。

中国古诗的美学也给我们以启发,就是中国式的境界和气象。在纷繁的诗歌花园里,中国古诗提示了一种温柔敦厚的、内敛的风格。古诗从诚挚的本心出发,关注自然风物,关注草木,追求情感与风景的融合。同时,古诗强调意在言外,在诗中留白,不把意思点破、说尽。这些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

我想中国古诗在技艺上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和古人用同一种质料工作,这个质料就是中文。在这一点上,外国诗歌不容易帮助到我们,尤其当我们阅读的是译文的时候。黄永玉说:自如地使用颜料,熟悉色彩的细微对照,光影的细微变化,然后才能成为画家。诗也一样。无论多么好的诗思,最后还是要落实为一个一个的汉字。汉字就是我们的颜料。叶嘉莹先生说她曾见过一些情感丰富、观察敏锐的人,但他们并不能作诗,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训练。诗歌的能力主要不是靠天生,而是靠后天习得,像李白那样的天纵英才很少,而杜甫那样的勤奋劳动者才是我们的榜样。

中国古诗词的篇幅都不长,题材又常常相近。这给了我们一种错觉,以为它们是重复的,空间狭窄,内容有限。但它们告诉我们的正是如何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腾挪,如何戴着脚镣跳舞。大家都写月,写怀远,但效果天差地别,于是苏东坡的中秋词一出,千古中秋词尽废。在“写什么”上,我们这些当代的写作者有更大的自由,而我们恰可以从古诗中学“如何写”。

在深入阅读古诗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对中文的“手感”,辨别词语的温度、湿度、浓与淡、轻与重、动与静、哑与响。这种追求也正是福楼拜所说的寻找“唯一准确的词”(le mot juste),也就是炼字。为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优于“春风又到江南岸”?为什么“漠漠水田飞白鹭”优于“水田飞白鹭”?对此中国古人费了许多心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目的未必是文学理论的建构,而更在于分辨好诗,写好诗。远到古人的许多诗话、评论,近到叶嘉莹先生等做的细读古诗词的工作,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资源。

中国是诗歌大国,我们是诗歌大国的子民,诗歌巨人们的后裔。在以西方诗人为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豪地以中国古人为师。我想,现在可能是我们重估中国古代诗歌对我们的价值,把自己的传统重新“拿来”的时候了。

新时代诗歌  
再出发

文艺部

## 广告

## 作家立场

五四·鲁迅·孔子 ..... 孙 都

浦东来去 ..... 张未民

坐卧之处 ..... 唐克扬

小说家的人间词话 ..... 盛可以

文学地理的虚与实 ..... 夏 商

品思录 ..... 胡赳赳

小 说 ..... 女人与狗 ..... 蒋子丹

我亦逢场作戏人 ..... 李修文

搂爹千古 ..... 学 群

唿哨和平弦 ..... 张 梓

流行 ..... 唐 颖

最爱胡椒饼 ..... 章 嘉

钓梦人(外一篇) ..... 严 敬

出花园之路(外一篇) ..... 林渊液

一只猫和八个词汇 ..... 赵荔红

绿洲之歌 ..... 南 子

时间的重量 ..... 孙 慨

绘画创作笔记两则 ..... 姜丹丹

研究与批评

“易读鲁迅”专栏之二:中国新文学的壮丽日出 ..... 郁元宝

张爱玲《封锁》漫谈 ..... 李 浩

《天涯》杂志官方微博(tyz1996),可一键下单,订阅杂志,亦可到邮局订阅或与本刊联系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20.00元/期,全年6期120.00元。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 电话:(0898)65360004 65332803。



2019年  
第三期要目

## 《扬子江》评论

2019年  
第三期要目

大家读大家 我读巴别尔——阅读《骑兵军》的笔记 方 方

另一个地方,另一种状态——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上) 格 非

文学史新视野(主持人 王彬彬) 善是难的,难的是美的——当下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方面 孟繁华

在个人与语言之间——论“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 娄燕京

新作快评(主持人 王 堇) 新作快评——读张楚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 郭茹芸

青年批评家论坛·青年写作的现状与前景(四) 行 超

对于现实的迷思——李宏伟论《